

论文选刊

中古漢語語料鑒別述要*

胡敕瑞

(北京大学中文系)

[提 要] 本文圍繞中古漢語語料的鑒別，簡要論述了中古語料存偽的情況、鑒別的方法、有效證據、以及注意事項，同時也穿插介紹了中古語料鑒別的一些成果。語料鑒別，其目的是為漢語史研究提供真實、典型的語料，限於篇幅，文中只討論了語料真實性問題。

[關鍵字] 中古漢語、語言鑒別、語料與史料

一

漢語史是研究漢語歷史發展的一門學問。要研究漢語的歷史發展，就必須依賴歷代保留下來的語料。如果不分時代，熔語料於一爐而治之，即便象《馬氏文通》那樣的開拓之作也難逃詬病；如果不辨真偽，把時代有誤的語料用來作研究，那更無異於

* 本文承蒙蔣紹愚師和沈培先生提供相關資料，蔣紹愚師并撥冗審閱了初稿。在此謹致謝忱！

是沙灘造屋。所以，在當今注重研究方法的同時，語料的鑒別同樣應引起重視。

語料鑒別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但具有不可忽略的意義。首先，語料鑒別可以為漢語史研究提供可靠的保障。“在語言的歷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資料選擇。資料選擇得怎樣，對研究結果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太田辰夫 1958，第 380 頁）其次，語料鑒別也可以為文獻學解決一些難題，如作品斷代、作者判定等。不少學者曾從語法、詞彙、語音等角度，對一些存有疑問的作品或作者作出過卓有成效的鑒定。再次，語料鑒別多從詞彙、語法、音韻等角度入手，從這一點來說，語料鑒別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研究。

漢語史研究需要充分占有語料，如果不作鑒別而誤用語料，就會帶來描寫不精或論斷不確的後果。譬如有學者在描寫《齊民要術》中“於/在+處所”句法位置的變化時，沒有區分卷首《雜說》等後世摻入的內容，描寫顯得粗糙，因而使得統計數據和結論抵牾；又如有學者引用署名為安世高的《佛說處處經》“佛言：意但當分別六衰，不當著著便不得道”一例，來說明體態助詞“著”已經在東漢出現，這恐怕是誤用語料的一個失斷¹，因為《佛說處處經》被證明並非東漢安世高所譯。由此足見，語料鑒別在漢語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前人（特別是清人）對上古語料做過不少董理辨偽的工作；相對來說，他們對中古以後的語料整理鑒別較少。為此，本文以中古語料的鑒別為主旨，概要介紹中古語料的鑒別情況，以期引起學界對中古語料鑒別的重視。

二

2.1 語料存偽的情況

梁啟超（1996，第 305 頁）曾說：“無論做那門學問，總須以別偽求真為基本工

¹ 這個例子不但時代有問題，斷句也不當。句當讀作“佛言：意但當分別六衰，不當著，著便不得道。”兩個“著”都是動詞，義為“貪染”。兩個‘著’並不連讀，第二個‘著’並非表示前一個‘著’的狀態。

作。因為所憑藉的資料若屬虛偽，則研究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偽，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費。”為此，他舉出歷史上大批造假的時期有“戰國之末、西漢之初、西漢之末、魏晉之交、兩晉至六朝、明中葉以後”六個，並且把偽書的性質分為十類²。就自己目力所及，中古語料存偽的情況（包括偽託作者、時代有誤、內容摻雜等），似可別為以下幾類：

- 1) 有些託名上古的著作，實際上是中古的作品。如託名列禦寇的《列子》、託名西漢孔安國的偽孔傳，其實都是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只是作者有問題，內容並無刻意擬古³。
- 2) 有些作品的年代雖有問題，但不出中古時期。如有些署名東漢譯人的譯經、認為漢末之作的《孔雀東南飛》等，這些作品雖然不能當作東漢語料運用，但當作中古語料使用仍然可以。
- 3) 有些注明為中古的作品，其中卻有近代摻入的內容。如《齊民要術》確為北魏賈思勰之作，但開首《雜說》則不是賈思勰的原著，很可能是唐人手筆。
- 4) 有些確定為中古的偽作，其中卻有上古原書的內容。如《孔叢子》確為晉人偽作，但其中《小爾雅》一篇，則為《漢志》舊本，應是秦末人孔鮒所撰。

第1)類雖然作者的真實性有問題，但如果因此廢置不用，則會喪失一些有價值的中古語料；第2)類雖然年代的真實性有問題，但把它們當作中古語料來使用不會有誤；第3)類如果不考慮語料的變化性，就會把近代的一些語料誤當作中古的語料來使用；第4)類如果不考慮語料的傳承性，又會把上古的一些語料誤當作中古的語料來使用。

在辨別語料存偽情況的同時，應特別注意語料之中的史料。研究歷史利用史料要

² 梁氏所總結的偽書十類為：1) 古書中偶見此書名，其書曾否存在渺無可考，而後人依名偽託者；2) 本有其書，但已久佚，而後人竊名偽造者；3) 古並無其書，而後人嫁名偽造者；4) 偽中出偽者；5) 真書中雜入偽文者；6) 書不偽而書名偽者；7) 書不偽而撰人姓名偽者；8) 原書本無作者姓名年代，而後人妄推定為某時某人作品，因以成偽或陷於時代錯誤者；9) 書雖不全偽，然確非原本者；10) 偽書中含真書者。

³ 有些作品是刻意仿古，語言桀屈敖牙，完全脫離造假時代的語言現實，如偽《古文尚書》，這類語料的利用價值，與上面一類不可相提並論。

辨別真偽，研究漢語史利用史料也要辨別真偽，不過兩者研究的對象不同，因而確定真偽的情況也不同。歷史學看重史料所記載的歷史事件是否真實，而漢語史則看重史料所運用的語言是否真實。

從漢語史的角度來看，如果史書敘述的時代與編著的時代不同，是以史書敘述的年代為標準，還是以編著的時代為標準？王力（1958，第 19 頁）在談到漢語史研究時，尤為強調認真地審查研究的對象，“所謂認真地審查研究的對象，就是要辨別史料的時代。……有些書雖然不是‘偽書’，但是我們不應該以書中所敘述的時代為標準，而應該以著書的時代為標準。書中所敘述某一個古人的談話，也不能輕信為那古人當時的語言。”這段話涉及到史料處理的兩個問題：1) 編著者的時代是否同於史料所敘述的時代？2) 編著者記錄前世的說語（即記言部分）是否同於編著者編輯的前世資料（即記事部分）？

對於第一個問題，洪誠（2000，第 106 頁）認為“著書時代不能作為辨別一切史料時代的標準”，並認為王力的原則只適用於部分史料，不能用之於一般。而且這一原則要具備三個條件：1) 這種史料全部是著者自己的語言；2) 這種史料在客觀上必須是同類的各種著述中最早的一部，最低的限度在現存的著作中是某種語言現象最早的紀錄；3) 它裏面沒有直接引述的前代語言。這樣看來，《史記》勉強符合條件，因為司馬遷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語言來記述史料⁴；而《晉書》等就不一定，因為房玄齡等編撰時多採用前代的材料（如採用《世說新語》《郭子》《啓顏錄》等），其中採錄《世說新語》就達 400 餘事。在洪誠看來，《晉書》這類史料的語言不能視為著書時代的語言，王力的原則只適合於著者用自己語言記述的史料，而不適合於著者編纂的史料。柳士鎮（1988）則似乎同意王力的觀點，認為“以成書年代作為史料時代的原則是比較穩妥的”。

對於第二個問題，有人認為應該將史料分為記事和記言兩部分，記事部分可以算是著者時代的語言，而記言部分則應視為說者時代的語言。這等於承認，史料中記言

⁴ 司馬遷雖然也引用上古材料（如《尚書》等），但多用其當時的語言改寫。

部分的語料要比記事部分的語料早。首肯這一結論的前提是必須保證史家在編著史料時，是原樣照錄歷史人物的言語聲吻。但是，這一前提很難有實現的可能，因為古代沒有錄音設備，何以保證史家用的都是“直接引語”；即便依賴前時檔案保留了“直接引語”，後代編者也難免會有改動。柳士鎮（1988）通過對《晉書》和《世說新語》的比較，證明《世說新語》中的人物言語在《晉書》中並非原文照錄，這一證明無異於否認了上面“記言部分應視為說者時代語言”的觀點。所以，王力認為“書中所敘述某一個古人的談話，也不能輕信為那古人當時的語言”還是有道理的。

2. 2 語料鑒別的方法

語料的鑒別離不開比較，而比較可以從不同的方面進行，如果從語料之間的比較來看，方法有三：

1) 被懷疑語料與同一文本的其他語料作對比。譬如《齊民要術》卷前《雜說》與同書其他正文相比較，通過比較，可以證明卷前《雜說》當是近代雜入。證據有：A. 詞彙上，如表示“耕田後平整土地的動作”義的詞語，《雜說》用“蓋”或“蓋磨”，而其他正文用“勞”為常；《雜說》有“第二遍”這樣詞頭與動量詞結合的用例，而其他正文無；B. 語法上，如《雜說》有“兩個月”這樣用量詞“個”來計時的用例，而其他正文無；《雜說》中“著”有體態助詞的用法，而其他正文中的“著”多是實義動詞；《雜說》多見“了”的虛化用法，而其他正文少見。（柳士鎮 1989）

2) 被懷疑語料與同一作者的其他語料作對比。譬如被確定為安世高所譯的《法受塵經》與安世高的其他譯經相比較，通過比較，可以證明《法受塵經》不是安世高所出⁵。證據有：A. 安世高譯經中第一人稱代詞幾乎都用“我”（共 162 例），只有兩例用“吾”，而這例外的兩例正出現在《法受塵經》中；B. 安世高譯經首句多是“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而此經首句是“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⁶；C. 此經用“是以”等文言詞，而不見“用是故”等見於安世高譯經中的詞

⁵ 如果考慮到口譯和筆受等複雜情況，結論恐怕並非如此簡單。

⁶ 《道行般若經》首句“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在《大摩訶般若經》中也對譯為“一時佛遊於王舍國其鷄山”。一般認為前者口語性強，後者文言成分濃，所以前者用比較口語化的“在”，後者則用文

語；D. 此經中多用“之”，而在安世高的譯經中少用“之”⁷；E. 此經中出現舊詞“女子”，這不但在安世高的譯經中是絕無僅有，乃至在整個東漢的譯經中也屬罕見，東漢譯經主要用新詞“女人”（達 264 例之多）⁸。

3) 被懷疑語料與同一時代的其他語料作對比。譬如託名東漢所譯的《大方便佛報恩經》與東漢同期的其他譯經相比較，通過比較，可以證明《大方便佛報恩經》並非東漢所出。證據有：A 詞彙上質的不同，《大方便佛報恩經》有“村”“覓”等新詞，而在時代確定的東漢佛經中不見這些新詞，只有語義相同的“聚/落”“求/索”等舊詞；B. 詞彙上量的不同，《大方便佛報恩經》“喚”19 見、“看”13 見，而在時代確定的東漢譯經中“喚”雖有 5 見，但其中 3 例有異文作“呼”，而“看”也僅僅 1 見，東漢譯經仍然多用“呼”“見”等詞，少用“喚”“看”等詞。

如果僅從語料自身著眼，語料鑒別又可從文獻學（包括“著錄”“卷數”“文例”等），文化學（包括“地名”“名物”“典故”“避諱”等），語言學（包括“詞彙”“語法”“語音”等）等角度入手，也可以綜合幾者來鑒別。

1) 從文獻學角度鑒別

首先，可以從著錄上考察。餘嘉錫（1983，第 1 頁）有言“或得一古書，欲知其時代、撰人及書之真偽，篇之完缺，皆非考之目錄不為功。”中古中土文獻若不見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唐·魏征等編）和《崇文總目》（宋·王堯臣等編）等，便值得懷疑；中古漢譯佛典若不見著錄於《出三藏記集》（梁·僧祐撰）、《衆經目錄》（隋·法經撰）、《開元釋教錄》（唐·智升撰）等，也值得懷疑⁹。如在《出三藏記集》和《衆經目錄》中都收錄了《大方便報恩經》，但均定為失譯，並未注明時代、譯人，後來誤

言化的“（遊）於”，可以與此處相印證。

⁷ 在被認為安世高的 16 種譯經中，竟然有 12 種譯經沒有見到“之”，只有 4 種譯經中有“之”，《法受塵經》就是其中之一。

⁸ “女子”在整個東漢譯經僅見兩例，除《法受塵經》中一例外，在《中本起經》還見一例。《中本起經》屬於文言成分較多的東漢後期譯經，出現一例“女子”不足為怪；而安世高譯經屬於東漢前期譯經，前期譯經口語性強，不應當出現文言詞“女子”。

⁹ 自東晉道安編撰《佛經目錄》把可疑的佛經專門編入《疑經錄》以來，後來編撰的佛經都很注意辨偽的工作，如《衆經目錄》分別五例，第四例“疑偽”專收可疑或確偽的佛經。

託東漢支讖所出並無經錄證據¹⁰。

其次，可以從卷數上考察。古籍流傳，卷數一般是由多變少，而不會是由少變多。如果卷數越來越多就值得懷疑，如《鶡冠子》在《漢志》中著錄僅一篇，而在《崇文總目》中則著錄為三十篇。據此可以判定《鶡冠子》一書顯然有偽，或託舊題而作、或據舊作添加，總之已非原書。

再次，可以從文例上考察。在此僅舉通假之例和用字之例，如《列子》中有以“童”通“同”、“住”通“數”、“肆”通“叱”、“視”通“指”等通假之例，張永言（1991）認為這些通假都是羌無故實的自我作古，因為在上古語料中並不見類似的通假，由此可見造偽者的斧鑿之迹。又如“見/現”“景/影”“華/花”“舍/捨”“采/採”“要/腰”等異體，斜線後者多是漢以後常用字例，所以如果某一語料多用後一種字例，則有助於確定其為中古語料。但由於文本流傳歷經抄寫，字例不一定反映原作原貌，其中不排除鈔胥的手改，因此字例最多只能作為一種旁證。

2) 從文化學角度鑒別

因為只有後人徵引前人而不會前人徵引後人，所以如在一部確定為某時某人的作品中出現了其後才有的地名、名物、典故、避諱等文化內容，就有作偽的嫌疑¹¹。

譬如《列子》中有“西域”地名，而宋人黃震在其《黃氏日鈔》中指出“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可見此書當不作於漢代之前；又《列子》中見“鍬鋸之劍”“火浣之布”等名物，張永言（1991）指出這都是由西土流入而盛傳於魏晉的名物，可見此書應當是魏晉人所作。

又如《孔雀東南飛》中“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一句，徐復（1958）認為其中“第五郎”應是虛指，典出《世說新語·棲逸》“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因此，世以“第五郎”來泛稱瀟灑男子。又《孔雀東南飛》中“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一句，其中“初陽”指初春，

¹⁰ 在隋僧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中開始著錄了一卷本和七卷本兩種，並注明一卷本為沙門支讖譯，誤託譯者蓋始於此。

¹¹ 不過應該注意的是，文化學上的地名、名物、典故、避諱等也有後人挖改的可能，所以在鑒別語料時不能光憑此種例證；況且這種例證往往只是個別的，缺少普遍性。

東晉人諱“春”字，所以把“春”改為“陽”。據此，此詩應非漢末建安詩人所為。

前一例是通过地名、名物来鉴别《列子》為晋人所伪；后一例是通过用典、避讳来鉴别《孔雀东南飞》非东汉作品。除地名、名物、典故、避諱之外，文化學的證據還有人名、年號、官制等等。

3) 從語言學角度鑒別

首先，可以從詞彙上考證。譬如梁曉虹(1996)通過“專有名詞”和“一般用語”，來證明《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譯。A. 專有名詞的證據，如康僧會所譯的《六度集經》喜用“泰山”“溝港、頻來、不還、應真”“除鐘”等意譯詞，而《舊雜譬喻經》喜用“泥犁”“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羅漢”“比丘”等音譯詞；B. 一般名詞的證據，如《六度集經》中用“巨細”“大理家、理家”等，而《舊雜譬喻經》中用“大小”“大姓”等。

利用詞彙來鑒別語料，應當選用有價值的詞語。具有時代、方言、發展特點的詞語，比較適宜作為鑒別的標準。A. 具有時代特色的詞語，如《孔雀東南飛》“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一句，其中的“蘭”就是一個有晉代特色的俗詞，義同“某”。《列子·說符》也有兩例：“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張湛注“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又《孔雀東南飛》“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中的“姥”也是晉代始用的一個詞語。根据这些具有晋代特色的词语，可以鉴定《孔雀東南飛》当是晋人所作。(徐復 1958) B. 具有方言特色的詞語，如《論衡·自紀》“以聖典示小雅，以野言說丘野。”刘盼遂《集解》引《集韵》云“吴人呼赤子为牙子。”并谓“今中国江、淮之域尚多呼小儿为小牙者”。又《論衡·死偽》“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章炳麟《新方言》卷六謂“今浙江猶謂棺之前端曰前和頭，音如華。”“小雅”“和”都是吴地方言詞。又《論衡》書中“或時”幾乎都作“或許”解，同樣的例子在東漢安世高、支識的譯經中也可見到，這應是當時洛陽一帶的一個方言詞。王充出生吳地（會稽上虞），遊宦洛陽，上面幾個方言詞正好與他的身世相合。清人梁章鉅認為《論衡》“文筆冗漫，實不類漢人所為”，不可信從。C. 新詞

（尤其是新興常用詞）新義（尤其是新興核心義）的價值。如汪維輝（2000，2001）根據“阿娘、阿婆、合眼、渾身、全家、歇、醒、要緊”等新詞，鑒定八卷本《搜神記》為北宋人作；又如張永言（1991）根據“侵”有“逼近”、“擬”有“準備”、“移時”有“過了好一會兒”新義，楊伯峻（1956）根據“舞”有“戲弄”新義，鑒定《列子》為晉代人作。

其次，可以從語法上考證。譬如曹廣順、遇笑容（1998）通過四種語法現象的考察，證明《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譯。這四種語法證據是：A. 總括副詞“都”的使用，《六度集經》（48 見）比《舊雜譬喻經》（3 見）使用頻率高得多；B. 完成貌句式中使用的完成動詞，《六度集經》有“已、竟、訖、畢”，《舊雜譬喻經》有“已、訖、畢”，但後者更趨向用“已”；C. 動詞連用格式的使用，《六度集經》超過 80 例，常用“化為（43 見）”、少用“化作（3 見）”，《舊雜譬喻經》有近 30 例，常用“化作（7 見）”、少用“化為（2 見）”；D. 疑問句式的使用，兩者疑問詞和語氣詞有差異，《六度集經》用“孰”“云何”等舊式疑問詞，且好用語氣詞“乎”；《舊雜譬喻經》不用“孰”“云何”等舊式疑問詞，語氣詞“乎”比前者少，反復問句末多用“不”。

再次，可以從音韻上考證。譬如徐復（1958）認為魏晉有陽唐和東韻通押、脂微皆灰哈和支韻通押、魚和尤侯的雜押的現象，《孔雀東南飛》中正好也有與魏晉用韻相符的例證。如“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此為陽唐和東韻通押；又如“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此為脂微皆灰哈和支韻通押。又如“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諸，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為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此為魚和尤侯的雜押。

4) 從綜合角度鑒別

語料中顯現的證據不一定成系統，有的只是一鱗半爪。因此，在鑒定語料時，不能僅憑單方面的只文孤例，而應該綜合諸法。如徐復（1958）考證《孔雀東南飛》為晉人所作，就是綜合詞彙、語法、用韻、用典、避諱等多方面的考證得出的結論。又如張永言（1991）考證《列子》為晉人張湛所作，也是結合假借文例、新詞新義、名物詞語等多方面的考證得出的結論。

2. 3 語言鑒別的有效證據

雖然綜合利用諸種證據是值得提倡的鑒別方法，但是也必須承認，在文獻、文化、語言三種鑒別方法中，語言鑒別是一種更為有效的方法。因為，雖然造假者有心作偽，可以避免在一些文化常識上露馬腳，但是他畢竟不是語言專家，在謔詞造句的時候難免不露蛛絲馬迹；其次，通過語言例證，不僅可以鑒別古籍的真偽、審定其寫作年代，還可以從方言的語法、用詞等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貫；此外，語言的證據也總是要比文獻、文化的證據常見易得，因為文獻、文化的證據零星少見，而任何語料都不能不形諸語言。

詞彙、語法、音韻是語言鑒別可資利用的三種證據，但三者的價值和效用是否又相等呢？其中是否可以區分出更為有效的證據呢？一般來說，有效的證據應當是“普遍性好、規律性強”的材料，下面用一個表格來條分三者的情況：

情 况 方 面 项 目	變化速度	變化數量	變化規律
語音	慢	少	強
詞彙	快	多	弱
語法	較慢	較少	較強

由上表可見，語音變化速度慢，數量也少；雖然規律性強，但普遍性顯然不及語法，更不及詞彙。這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證據，因為韻文的材料畢竟有限。

詞彙變化比語法速度快、數量也多，普遍性好，因而有些學者（如徐復、汪維輝）特別強調詞彙證據。徐復（1958）認為“它是最現實的，也是變化最敏感的東西，只要時代一有了變化，它就跟著產生了新的詞語。所以要推測一篇作品的寫作年代，只有從詞彙中去探求，才能得出較為正確的結論。”“古韻和語法上的一些變化，在考證年代上，只作為輔助的辦法。當有了語言上別種強有力的證據時，這些事例可以作個次要的證據的。”針對詞彙比語法規律性弱，汪維輝（2000）強調“詞彙同樣具有時代性，一個詞或一個義項始見於何時，雖難以說得絕對準確，但大體上是可以考定的。尤其是一些在歷史上有過歷時更替關係的常用詞，它們的發展變化很有規律，時代性尤為明確。”因此他認為“從語言角度鑒定古籍年代，詞彙也應該是一項重要的依據，至少跟語法現象有著同等的價值，甚至可能比語法方面的證據更可靠，因為一般說來，詞彙比語法變得快，時代性更強。”

語法雖然比詞彙變化速度慢、數量要少，但普遍性比語音好、規律性比詞彙強，因而有些學者（如江藍生、柳士鎮）特別強調語法證據。江藍生（1987）認為“與詞彙相比，語法方面的現象更具有規律性、普遍性，因而也更可靠些；詞彙方面，由於我們畢竟不能遍覽群書，見聞難免漏缺。所以詞彙方面的現象難以與語法方面的同等

對待，把他們作為參考鑒定詞比較合適。”柳士鎮（1989）承認語法變化的速度比不上詞彙，“但是，也正因為它們的發展變化比詞彙要緩慢，因而它們一旦發生了變遷，其鑒別作品時代性的作用也就顯得更加重要而可靠。”

誠然，詞彙變化速度快、數量多，在沒有或罕見語法、語音證據的語料中，詞彙的例證自然獨佔鰲頭，它的有效性突出表現在證據的數量上；語音和語法變化速度慢、數量少，但在同時兼有三種證據的語料中，語法和語音的例證應當另眼相看，它們的有效性突出表現在證據的質量上。語料鑒別的有效方法，應是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證據，普遍性和規律性相結合，質量並重，而不應厚此薄彼。江藍生（1987）根據六個語法證據（疑問副詞“還”、測度副詞“莫”、概數助詞“以來/來”、助動詞“要”、人稱代詞“你/某”、自稱代詞“兒/兒家”）、四個詞彙證據（遮莫、伍伯、關節、心口思維）考定八卷本《搜神記》出自晚唐五代或北宋人之手，方一新（2003）根據三種語法證據（判斷句、被動句和疑問句）、兩種詞彙證據（一般語詞和“～切”式複音詞）考定《大方便佛報恩經》為魏晉以後譯經，都是綜合利用語法、詞彙證據的成功範例。

四

鑒別語料，去偽存真，既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也是一項細緻的工作。前賢時哲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績；但是也應該看到，也存在某些不足。針對這些不足，可以歸納兩點注意事項：

1) 用作鑒定的例證一定要準確可靠。譬如徐復（1958）為鑒定《孔雀東南飛》非東漢而是晉代之作，舉出詩中用了“不堪（不能忍受）”“爾（應答聲）”“啓（啓白）”等晉代新詞。然而，這些例證並不可靠，因為東漢已有這些詞，它們并非晉代新詞，僅舉東漢佛典為例：

《阿闍世王經》：“其器者以不堪菩薩心。”

《道行般若經》：“須菩提報佛言：“爾，天中天！”

《修行本起經》：“當卜所宜，別自啓白。”

又如梅祖麟(1982)舉出方位詞“裏”、動量詞“通”、詢問詞“那”、非被動“見”、第三身代詞“渠”、著重語氣的“是”、暱稱“卿”、必然義的“會”、隨即義的“登即”、後置詞“復”等10項虛詞的用例證明《焦仲卿妻》之作不應早於五六世紀,但是魏培泉(1993)觀察到,除動量詞“通”和第三身代詞“渠”外,其餘8項都有見於漢代的例子。如此看來,徐、梅二人用作鑒定的例證不但不成證據,反倒是成了反證。所以選用例證來鑒定語料時,一定要選用準確可靠的例證。

2) 用作鑒定的例證一定要有代表性。譬如梁曉虹(1996)為鑒定《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作,舉出《舊雜譬喻經》中的“大姓”和《六度集經》中的“理家、大理家”用詞不同,這個例子恐怕不具代表性。因為兩個名詞並非如其所言都是表示“世家、大族”義的等義詞,“理家、大理家”應該是“財主、大財主”的意思。兩詞詞義各異,又不是同經異譯,缺少可比性。又如方一新(2003)根據語法、詞彙有效地證明了《大方便佛報恩經》非東漢譯品,但其中所用的“全身”等詞似乎還可商榷。因為東漢佛典雖無“全身”,但是可以見到“盆頭”。如果東漢佛典沒有“髣物汗身”這一概念,自然不會用“全身”一詞;如果真有“髣物汗身”這一概念,根據東漢佛典有“盆頭”,出現“全身”一詞並非不可能。所以選用一般詞語來鑒定語料,一定要看其是否具有代表性。

為了更好地開展中古漢語研究,有必要對期間的中土文獻和漢譯佛典進行系統的搜集、整理和鑒別。中古漢語語料的鑒別,目的是為中古漢語研究提供理想的語料。理想的語料既要可靠,又要典型。可靠即要求材料真實,典型即要求口語性強。限於篇幅,本文只論述了前一個問題,後一個問題容後再論。

參考文獻

- 曹 焯 1994: 南北朝至明代的音韻學史料概論,《吳中學刊》第 2 期。
- 曹廣順、遇笑容 2000: 從語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譯經的翻譯年代問題,《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三輯,巴蜀書社。
- 1998: 也從語言上看《六度集經》與《舊雜譬喻經》的譯者問題,《古漢語研究》第 2 期。
- 曹廣順 1987: 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中國語文》第 3 期。
- 曹培根、曹焯 1991: 漢語史料學概論,《吳中學刊》第 4 期。
- 岑仲勉 1958: 《列子》非晉人偽作,《兩周文史論叢》,商務印書館。
- 陳連慶 1981: 《列子》與佛經的因襲關係,《社會科學戰線》第 1 期。
- 陳雅飛 2003: 近四十年來《蘭亭序》真偽的三次論辨,《文史知識》第 2 期。
- 程章燦 1994: 《西京雜記》的作者,《中國文化》第 9 期。
- 方一新 1996: 東漢語料和詞彙史研究芻議,《中國語文》第 2 期。
- 2000: 《大方便佛報恩經》語彙研究,《浙江大學學報》第 5 期。
- 2002: 漢譯佛典語料的使用和鑒別,第三屆“海峽兩岸漢語史研討會”論文。
- 2003: 翻譯佛經語料年代的語言學考察——以《大方便佛報恩經》為例,《古漢語研究》第 3 期。
- 2004: 作品斷代和語料鑒別,《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簡報》(總)第 13 期。
- 高小方 1999: 洪誠先生對於漢語史語料學的貢獻,《南京社會科學》第 12 期。
- 古苔光 1976: 《西京雜記》研究,《淡江學報》第 15 期。
- 洪 誠 2000: 關於漢語史材料的運用問題,載《洪誠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
- 季羨林 1957: 《列子》與佛典——對於《列子》成書時代和著者的一個推測,載《中印

文化關係史論叢》，人民出版社。

江藍生 1987：八卷本《搜神記》語言的時代，《中國語文》第 4 期。

蔣紹愚 1994：《近代漢語研究概況》第六章第一節“作品的斷代”，北京大學出版社。

勞 榦 1962：論《西京雜記》之作者及成書年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3 本。

梁啓超 192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四章），東方出版社 1996。

梁曉虹 1996：從語言上判定《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譯，《中國語文通訊》第四十期。

劉 禾 1980：從語言的運用上看《列子》是偽書的補正，《東北師大學報》第 3 期。

劉文忠 1984：《漢武故事》寫作時代新考，《中華文史論叢》第 2 期。

柳士鎮 1988：《世說新語》《晉書》異文語言比較研究，《中州學刊》第 6 期。

1989：從語言角度看《齊民要術》卷前《雜說》非賈氏所作，《中國語文》第 2 期。

陸侃如 1929：《孔雀東南飛》考證，《國學月刊》第 3 期。

呂叔湘 1986：《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彙釋·序》，《中國語文天地》第 6 期。

馬 達 1996：對清代關於《列子》辨偽的匡正，《衡陽師專學報》第 5 期。

馬振亞 1995：從詞的運用上揭示《列子》偽書的真面目，《吉林大學學報》第 6 期。

梅祖麟 1982：從詩律和語法來看《焦仲卿妻》的寫作年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3 本第 2 分。

牟玉亭 1994：文獻目錄與古籍辨偽，《古籍整理與研究學刊》第 3 期。

太田辰夫 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跋》（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唐鈺明 1993：利用佛經材料考察漢語詞彙，《中山大學學報》第 4 期。

汪維輝 2000：從詞彙史看八卷本《搜神記》語言的時代（上），《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三輯，巴蜀書社。

2001：從詞彙史看八卷本《搜神記》語言的時代（下），《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四輯，巴蜀書社。

王 力 1958：《漢語史稿》（上）第一章“緒論”，中華書局 1980。

- 王範之 1963: 《穆天子傳》與所記古代地名和部族,《文史哲》第 6 期。
- 王魁偉 1994: 太田辰夫語料觀說略,《日本研究》第 1 期。
- 1995: 讀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跋》,《中國語文》第 2 期。
- 2000: 關於語料問題的幾點思考,《福州大學學報》第 3 期。
- 王顯 1996: 從史實和用詞來確認《離騷》等篇的作者,載《古漢語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
- 王越 1933: 《孔雀東南飛》年代考,《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 2, 15—29 頁; 1: 3, 69—80 頁。
- 王雲路 1995: 漢魏六朝語言研究與中古文獻,《中國語言學報》第七期。
- 魏培泉 1993: 論用虛詞考訂《焦仲卿妻》詩寫作年代的若干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2 本第 3 分。
- 徐復 1958: 從語言上推測《孔雀東南飛》一詩的寫作年代,《學術月刊》第 2 期。
- 許威漢 1982: 從《世說新語》看中古語言現象,《江西師院學報》第 2 期。
- 楊伯峻 1956: 從漢語史的高度來鑒定中國古籍的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新建設》第 7 期。
- 1979: 《列子集釋》附錄三“辨僞文字輯略”,中華書局 1997。
- 余嘉錫 1983: 《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
- 俞理明 1987: 漢魏六朝佛經在漢語研究中的價值,《四川大學學報》第 4 期。
- 張能甫 2000: 對《東漢語料和詞彙史研究芻議》的補說,《古漢語研究》第 5 期。
- 張為騏(民國): 孔雀東南飛年代祛疑,《國學月報》2 卷 11 號。
- 張永言 1991: 從詞彙史看《列子》的撰寫年代,《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 朱承平 1991: 應當重視文獻語言材料和方法的研究,《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 3 期。

A summarization on judging the texts of Middle Chinese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how to judge the genuine texts of Middle Chinese, in which we introduce simply the cases of false texts, the methods of judgment and the available evidences, and offer some advices on judgment. Judging the texts is in order to study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besides paying attention to genuine texts, one also should chooses typical texts in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about the later we will discuss in another paper.

Keywords : Middle Chinese, language evidences, language data and history data

二十一世紀 漢語史學者的學術追求

李宗江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

[提 要] 本文概括了 20 世紀漢語史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的主要特點，即現代語言學理論 和方法與傳統語文學理論和方法的結合運用，主張 21 世紀漢語史學者應在理論意識、世界眼光和未來指向等方面有更高的追求。

[關鍵字] 漢語史研究 理論 方法

二十世紀的漢語史研究就其理論和方法說主要是兩個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運用傳統語文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的研究，包括音韻、文字、訓詁等；另一方面是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進行的研究，包括語法演變、辭彙發展、語音變化（如運用內部擬測法對漢語歷史語音系統的構擬）、方言史等。就理論和方法來說，外國語言理論和方法對漢語史研究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傳統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近年來功能語言學也開始對漢語史研究產生影響，如認知語法、語法化理論等。這是就其要者而言。其實不論境內學者還是境外學者，也不論是老一代還是年輕的一代，

在自己的研究中完全使用本土的理論和方法或完全使用外來的理論和方法的都不多。一個鮮明的特點是兩者的綜合運用：一是主要用現代國外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同時參照中國傳統的理論和方法，比如高本漢關於漢語歷史語音的研究、羅傑瑞關於漢語閩語歷史語音的研究等，我們還沒有發現哪一位學者完全不用漢語音韻學的方法和研究成果，純粹用現代語音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任何一個平面的漢語語音系統，且把兩個平面之間的聯繫說清楚。再比如語法史的研究，由於本土原本沒有系統的漢語語法理論，所以使用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是從國外來的傳統語法的句子結構和詞類理論，但哪本語法史也離不開傳統意義上的虛詞（包括現代意義上的代詞、副詞、甚至是名詞和動詞中的一部分，如時間名詞、方位名詞，能願動詞等）研究的成果。二是主要用傳統語文學的方法，同時也借鑒現代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比如王力的音韻學也運用了現代語音學的理論和方法，張永言、郭紹虞等的訓詁研究也運用了現代語義學的理論和方法等。中外結合，這應該是漢語史研究的方法論原則，魯國堯先生（2003）開明宗義地提倡：“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將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結合、融會。”在這樣的一個大的背景和原則之下，我們覺得 21 世紀的漢語史研究應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所追求，即理論意識、世界眼光和未來指向。

一、理論意識

漢語史的研究可以包括微觀和宏觀兩類。微觀的研究主要是指以字或詞或句式為個案的研究，包括其語音的變化，意義的演變和語法特徵的變化；同時也應該包括對典型語料，如專書、專人作品或某類特定的言語作品（如唐詩）語言特點的研究，包括某個特定範疇演變的研究，如聲母演變的研究，某個詞類演變的研究。宏觀的研究是指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對一個時期或整個漢語在某一方面（比方語音或語法）或全面發展脈絡的勾勒。同時漢語史的研究還可以包括描寫和解釋兩個方面。描寫是對語言事實的梳理和認定，解釋是對此一事實與彼一事實之間或語言演變與相關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繫的說明。但不管是哪一層次的研究，理論的意識和自覺都非常重要。所謂

理論是對語言歷時演變發展內部規律的概括和假設，就漢語史的研究來說，我以為理論追求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含義：

1. 傳統理論的總結。這方面做得不夠。我國有豐富的語言歷史研究的成果，雖然並不都屬於現代意義上的語言學的研究，但某些方面的成就並不差。比如音位的概念，中國人很早就有了，例如無論是唐代守溫和尚的三十字母，還是宋人的三十六字母，當然並不是當時實際的發音中只有這些聲母（作聲母的輔音音素），而是經過了歸併以後得出的結果，不管它的歸併是否完全正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根據音素區別字義的作用來歸併的。漢語四聲的概念很早就提出來了，為什麼是四聲而不是五聲六聲（就字音聲調的實際調值說，永遠不會只是四種），也是從別義的角度來分析的，這就是音位的概念。再如國外的語法化的研究很熱鬧，其實相關的思想我國早在十三世紀就提出了（沈家煊 1994）。很多工作古人都做過了，話也說過了，但很多東西沒有形成嚴密的體系，缺少嚴格的表述。因而需要總結提升。比較而言，這種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進行總結提升的工作，語音方面做得比較好，現代語言學家把漢語傳統的音韻學理論與現代語音學理論結合進行的研究也比較成功，但語法和辭彙方面做得不夠，語法方面比如傳統虛詞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被基本上拋開了。辭彙方面好像是分治的，有的人是傳統的訓詁的研究，另一部分是現代意義上的辭彙和語義的研究。這種狀況應該改變。

2. 新理論的創造。這就是在研究的時候根據漢語的事實來進行理論的創新。在現有的語言學理論中，包括語言發展變化的理論，由中國人發明的似乎不多，對這種情況，有人將其歸為中國人理論思維的缺乏，理論的意識不強。在 21 世紀應該有更多的來自漢語史研究事實的理論成果，能夠進入世界。這倒不是從政治愛國意義上講的，而是說明理論的創新也是可以來自由中國人用漢語事實進行的研究，就像辭彙擴散理論那樣，再比如韓禮德的功能語法也與漢語事實的影響有關。

3. 國外語言理論的借鑒。現代語言學理論的主流是以印歐語系的語言為研究對象而建立的，語言和漢語不同，但理論同樣可以適用於漢語。至於有時候出現了偏差，

那不是理論的錯，是應用理論的研究者的錯。理論應該具有普遍解釋力，否則就不成其為理論。中國人與西方人的人種不同，但根據西方人體結構建立的人體生理系統的理论同樣可以用來說明中國人的人體結構，西醫也同樣可以治好中國人的病。有一些說法是值得懷疑的，如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要建立適合於漢語自身特點的理論等等，這種說法語義含糊，經不起推敲，貌似正確，但毫無用處。比如什麼叫中國特色？這個政治詞語拿到語言研究中行不行？什麼叫漢語自身的特點？特點都是在比較的基礎上談的，不知道共性怎麼知道特點？因而我們認為 21 世紀漢語史的研究應該更加注意吸收國外語言研究的成果，注意用國外的語言學理論來說明漢語的事實。

4. 注重研究的科學性。所謂研究的科學性，我以為在漢語史的研究中應該特別注重講求實證、系統地看問題和追求邏輯的嚴密。在漢語史研究領域簡單化的現象，想當然的現象，以今證古的現象時有發生。舉一個在這三個方面都有值得商榷之處的例子。康振棟（2003）試圖解釋“了”在中古漢語中為什麼“只限於跟否定詞連用”，結論是“了”在中古是一個強調否定語氣的語氣副詞，直接來源於總括副詞。即當總括副詞用於否定動詞前時，就有了強調否定語氣的作用。但是這樣的結論如果成立，必須回答兩個問題，一是要舉出“了”用於肯定動詞前作總括副詞的實例，二是要說明其他的總括副詞如“皆、悉、盡、鹹、俱”等都可以用於否定動詞前，但為什麼唯獨“了”固定在了否定詞前？對於第一個問題，作者舉出的例子是“我財物了盡”之類的同義詞連用的情況，認為這是“了”“由動詞向範圍副詞虛化的根據”，是人們把並列結構重新分析為偏正結構的結果。我們認為要證明“了”由動詞演變為範圍副詞可以舉它出現在其他任何一個動詞前的例子，但唯獨舉用於同義動詞前的例子最沒有說服力。因為同義詞連用是漢語裏非常常見的現象，你說範圍副詞“了”是在這種結構中重新分析來的，無非是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了盡”也可以理解為“都盡”，這是因果倒置的論證方式。對於第二個問題，作者的回答是因為其他的範圍副詞是表示總括，而“了”是表示強調否定，這不是循環論證麼！

二、世界眼光

所謂世界眼光，是指跳出漢語自身來看漢語才能看得更清楚，應該站在世界語言的高度來看漢語的發展，否則就會“不識廬山真面目”。我們不能僅就漢語來說漢語，否則你得出的結論就是值得懷疑的。比如有人認為漢語新詞語中有多音節詞語大量產生，這“顯然跟社會的發展、思維的豐富息息相關。紛繁精細的思維內容已不滿足於依靠構造精密的句子來表達，要求句子的構成要素——語詞也滿載資訊負荷。這樣，原來在漢語辭彙庫中的雙音複合詞就擔負不了這一交際使命，促使了以三、四音節為主的音節詞語的產生。”（姚漢銘 1998）^①我們且先不論所謂三四音節詞語大量產生這個結論是否可靠，就算是這樣，這種解釋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如按這種說法，就會推出一個必然的結論，即：社會越發展，詞語就越長，而社會總是發展的，所以所有的語言的詞語都應是越來越長的。而且詞越長的社會就越是發展的社會，人的思維就越豐富。這符合世界語言的實際情況嗎？我們無法接受這樣的邏輯。再比如有人說漢語詞綴具有虛實結合的特點，這是由於“漢語沒有也不可能具備嚴格意義上的形態變化”（沈孟璽 1995）。說漢語沒有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基本符合事實，但說不可能有，這是為什麼？是站在語言普遍規律的立場說的？還是站在漢語的立場上說的？至少從國外語法化理論的角度說，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有形態的語言的構形成分也是由實義的詞演變來的，語言在不斷發展，為什麼漢語就一定不可能演變成有形態的語言呢？從漢語歷史的發展來看，現代漢語似乎也比古代漢語有更多的形態或類形態成分。至少這種結論是難以論證的。我們堅信語言的共性是主要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從其他語言的研究中受到啟發。再比如漢語被動句從古到今都有表義上的特點，即傾向於表示“不幸”、“不愉快”、“不如意”的事情，這是一個事實，但該怎麼解釋它？主要的意見是認為受到典型被動標記“被”的來源的影響，因為“被”來源於表示“遭受”意義的動詞，所以在成為被動標記後，也把原來的表義特點帶進了被動句（王力 1957、橋本萬太郎 1987、李珊 1994）。這種解釋僅就漢語說

也許勉強可以②，但實際上這種現象不只是漢語有，張敏（2000）認為：“漢語裏含被動標記的被動句通常含不幸意味，這個特性不僅僅為漢語所獨有，它也體現在東亞、南亞和東南亞包括漢藏語、台語、孟高棉語在內的多個語言裏，是一項區域特徵。”沈家煊（2001）也談到：“漢語、日語、泰語等語言的被動式都附帶不如意的主觀感覺”。我們考察的結果支援張敏和沈家煊二位先生的結論，似乎還不僅僅是這些語言。如在緬甸語、越南語、印地語、蒙古語、朝鮮語等語言中都發現了類似的現象。③當一種語言現象成爲一種區域特徵或語言普遍現象時，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作出解釋：第一個角度是有相同的內部形成機制。如張敏（2000）談到“具有該特徵（指被動句含有不幸意味）的語言，其被動標記多半來源於[遭受]義、[使役]義和[給予]義動詞”。但除了[遭受]義動詞對被動句表示不幸的語義特征形成的影響有較強的說服力外，由其他兩種意義變來的被動標記何以會對被動句的語義特點構成影響，似沒有令人信服的說明。第二個角度是語言間互相影響的結果。比如是漢語被動句的表義特徵影響了周圍的語言或者是漢語是受了其他語言的影響，如像橋本萬太郎（1987）所說的那樣，漢語被動句標記南方方言來源於“給予”動詞，是受到了南亞語言的影響，北方的被動標記來源於使役動詞，是受了阿爾泰語系的影響。但這樣仍然要解釋，如果是漢語影響其他語言，那麼漢語是怎麼獲得這一特徵的，同時還要說明這種影響是怎麼發生的。第三個角度是把這一現象看成是一種基於認知或功能的語言共性現象。反正不管採取哪個角度，我們都必須面對其他語言的類似現象做出統一的解釋。

三、未來指向

專業分工使我們把研究對象割裂開來了，有專門研究漢語史的，有專門研究現代漢語的，這樣就要劃一個邊界，某一個時代以前的算史的部分，以後的是現代漢語的部分。其實語言的發展就像一條河流，中間是沒有邊界的。我們從歷時的角度來看漢語，應該有整體的眼光，所謂未來指向就是得跨躍時代來考慮問題。我們研究漢語史，不僅僅是描寫語言在過去各個時期的語言事實，還原歷史，其根本的價值是探討語言

演變的規律，並用這種規律來說明語言的現實表現和未來走向。研究語言的歷史可以有兩個起點。一個是起於今，即從當前存在的語言現象著手，逆流而上，追溯它們的歷史，搞清楚這些現象是從哪兒來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內部擬測法，就是從今天出發來重建歷史的。一個是起于古，即確定一個足夠遠的有文字記載的時代，順流而下，探討語言要素的從無到有，從有到無，從此到彼。作為有大量歷史文獻的語言，後一種起點是漢語史研究更具根本性的東西，因為其研究所站的角度始終是面向未來的。就像我們從一個河流的源頭開始順流而下，每一步都是走向未來的，這樣我們才更便於發現其大致的走向，並從而預測未知，想象未來。我們所說的未來指向有兩層含義，一是在研究某一個時代的語言現象時，要觀照下一個時代。離開對未來時代情況的掌握，我們往往會把問題簡單化。語言的演變並不像歷史比較法所假設的那樣，是很規則的，沿著一個相同的軌道前行的，語言的演變有時是有例外的，不規則的。比如對表示進入意義的“進”的產生年代，太田辰夫（1987）認為始於元代，志村良志（1995）認為直到唐末還未見使用。其實“進”早在東漢，至遲到六朝時期就可以表示前進的意義，且可以作趨向補語了（李宗江 1997、汪維輝 2000）。按照一般的規律，到唐宋時期“進”的用例應該多於六朝，至少不應該少於六朝，可是事實卻不是這樣，反而在唐宋時代的文獻裏很少見到④，其發展似乎停止了，而到了元明時代才又重新多起來。太田辰夫和志村良志的結論就體現了這一點。這種情況看上去似乎有點違反常規，但這是事實，而且不是個別的現象。如曹廣順（1987）就曾談到副詞“就”，作“迅速”義解的形容詞“快”，代詞“這、這底”，表複數的“們”，句式“動+了+賓+了”，語氣詞“了”和“了也”等六種辭彙語法現象出現“循環變化”的現象，即：宋代用或多用，元代不用或少用，明以後又恢復到宋代的情況。未來指向的另一層意思是說漢語史的研究應該通向現代，甚至瞄向未來。就是說我們研究的語言歷史的演變規律要能夠解釋現在，甚至預測未來。這樣的期望可能有點高，但科學研究不能不樹立這樣的目標。如果承認語言的演變是有規律的，那麼就得承認是可以見往知來的。當然預測的結果僅僅是一種可能性，最後需要歷史的驗證。比如漢語從古到今同現代

漢語副詞“才”意義和用法類似的副詞主要有“始、方、才”等幾個，其意義和用法以“才”爲例，主要是：

1. 表示動作在不久前發生。如：他才走。
2. 表示兩個動作距離時間短。如：他才走你就來了。
3. 表示事件發生得晚或事情過程過長。如：他半夜才回家。
4. 表示邏輯關係。如：只有依靠群眾才能做好工作。

前兩種意義上“才”重讀，表示時間概念；後兩種意義上“才”不重讀，淡化時間概念，而強化邏輯上的承接作用。“始、方、才”等幾個副詞的演變規律是先獲得以上 1、2 兩種用法，然後通過第 3 種用法發展到第 4 種用法。我們可以據此建立一個“才”類副詞的演變模型，按照這個模型來觀察現代漢語的副詞“剛”，以上前三種用法它都有了，如可以替換前 3 個例句中的“才”，只是還沒有第 4 種用法。我們推測它可能也會向這種用法演變。（李宗江 2000）

在世界跨入二十世紀之前，索緒爾爲語言學劃定了地界：語言和言語主要研究語言，形式和意義主要研究形式，共時和歷時主要研究共時……，進入 21 世紀，語言學的發展已經打破了索緒爾所劃定的界限，語言的共時狀態不過是歷時發展的橫截面，就像不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就無法知道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一樣，無論從對語言的認知角度還是從語言應用的角度，當代的語言研究都對語言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作爲漢語史學者，也應該有更高的科學追求，我們希望通過如上的追求能夠使漢語史研究出現新的面貌，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附注

①這段話中所涉及的幾個概念非常模糊，比如“思維的豐富”，“紛繁精細的思維內容”是什麼意思？照此說法，漢語詞原來以單音節為主，那麼說明當時人的思維比現在簡單，比現在粗放？再比如一會說“雙音節複合詞”，一會說“多音節詞語”。要知道“詞”和“詞語”是不同的，如果把“語”算上，恐怕哪個時代的漢語，哪種語言裏都是多音節的占多數。

②其實嚴格地說對漢語也不能解釋，因為它不能解釋為什麼在“被”字句產生之前的“爲”字句、“於”字句、“見”字句也有這種傾向。

③考察的辦法分爲2種，一種是請某些國家的留學生隨意寫出自己語言的5個被動句。第二種辦法是請學習某種語言的研究生找所學語言的一篇口語性的文學作品，把其中的被動句都找出來，進行分析。

④關於這個結論有不同的意見，董志翹（1998）認爲唐宋比六朝有所發展，用例“觸處可見”，這主要涉及所用語料問題，還可以再討論。但在一些公認的接近口語的唐宋文獻中確實很難見到，如《祖堂集》、敦煌變文、唐詩、《五燈會元》、《朱子語類》以及劉堅、蔣紹愚先生主編的《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的唐五代卷和宋代卷中均未見典型用例。

參考文獻

- 曹廣順（1987）試說“快”和“就”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中國語文》第4期
- 董志翹（1998）再論“進”對“入”的歷時替換，《中國語文》第2期
- 蔣紹愚（1995）內部構擬法在近代漢語語法研究中的運用，《中國語文》第3期

- 康振棟（2003）中古漢語裏否定詞前的“了”字，《中國語文》第4期
- 李 珊（1994）現代漢語被字句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宗江（1997）“進”對“入”的歷時替換，《中國語文》第3期
- 李宗江（2000）漢語“才”類副詞語法化的規律，《面臨新世紀挑戰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陸儉明主編，98現代漢語語法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山東教育出版社
- 魯國堯（2003）論“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古漢語研究》第1期
- 橋本萬太郎（1987）漢語被動式的歷史區域發展，《中國語文》第1期
- 沈家煊（1994）語法化研究綜觀，《外語教學與研究》第4期
- 沈家煊（2001）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第4期
- 沈孟璽（1995）試論新詞綴化的漢民族性，《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
- 太田辰夫（1987）中國語歷史文法，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 汪維輝（2000）東漢一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大學出版
- 王 力（1957）漢語被動式的發展，《語言學論叢》第1輯
- 姚漢銘（1998）新詞語社會文化，上海辭書出版社
- 張 敏（2000）語法化的類型學及認知語言學考量，中國第九屆近代漢語學術研討會論文（溫州）
- 張永言（1985）訓詁學簡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Academic Interest of Chinese Linguistic History Researchers in 21st Century

Abstract: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Chinese linguistic history researches in the 20th century are characterized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in the following ways: combining modern linguist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with that of traditional philological researches, and advocating that researchers in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hold higher objectives regarding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fulness.

Key words: Chinese linguistic history research; theory; methodology

基地建设

汉语史研究中心召开学期工作会议

3月21日下午，我中心在东一教学楼612会议室召开学期工作会议。会议由方一新主任主持，主要议题是评选第三届丁邦新语言学奖，布置本学期工作及今年十月召开的“汉语史国际高级论坛”的准备工作。

会议首先由丁邦新语言学评奖委员会对报奖论文进行评议，并投票评出博士生一二等奖及硕士生一等奖，获奖者共四人。方一新主任宣布了中心主任会议的任命决定：姚永铭老师任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张涌泉副主任介绍了“汉语史国际高级论坛”的筹备情况，会议商定本次论坛由汉语史研究中心与浙江省语言学会共同主办。与会人员还就论坛的规模、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讨论。

参加此次工作会议的中心成员还有：颜洽茂、俞忠鑫、黄金贵、黄笑山、许建平、姚永铭、池昌海、陈东辉、刘锋。

方一新主任赴京参加中央党校研修班

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教育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4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班。我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已于3月31日赴京参加该研修班，为期一个月。

学术交流

台湾政治大学竺家宁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讲座

1月19日,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竺家宁先生来我中心作学术讲座,题目为《台湾地区汉语史研究状况》。竺家宁先生长期从事音韵学、词汇学研究,著有《声韵学》、《古汉语复声母研究》、《音韵探索》、《汉语词汇学》等多部著作,是一位活跃在汉语史学界的知名学者。

在讲座中,竺先生引用成说,用15个字概括了台湾地区的汉语史研究现状:“音韵盛、方言偏、语法西、词汇贫、训诂旧。”“音韵盛”主要表现为致力于音韵研究的学者较多,并有专门的影响力较大的刊物,如《声韵论丛》。“方言偏”表现为偏重闽南话和客家话研究。“语法西”则是指从事语法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外文系出身,他们大量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词汇贫”指的是相对于大陆汉语词汇研究而言,台湾地区该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研究范围主要限于汉语的构词法问题。“训诂旧”则是指台湾地区从事训诂研究的学者多因袭清儒传统,缺少创新。针对这一现象,竺先生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研究汉语史不能只偏重一个领域,应兼顾其他,力求全

面；第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应注意借鉴现代理论和西方成果。

此外，竺先生还具体介绍了台湾佛经词汇研究的情况。他指出，台湾地区佛教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佛经语言的研究。“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则进一步促进了该领域的学术交流。同时，竺先生也谈到了自己在佛经词汇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如：构词的双音化倾向、词义的演化等等。

与会师生对讲座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就相关问题与竺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錫博士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3月23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敦煌学家方广錫博士来我中心作题为《禅与禅宗》的学术报告。

科学研究

《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入选 商务印书馆《中国语言学文库》

经专家匿名评审，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评议委员会会议讨论和评选，本中心2004届毕业的张小艳的博士论文《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入选商务印书馆2004年度语言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将作为《中国语言学文库》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人才培养

博士后荒見泰史出站

2005年3月23日，本中心博士后荒見泰史举行出站报告会，他报告的题目是《敦煌讲唱文学文献写本的研究》。考核小组由著名敦煌学家方广錩教授、本所许建平副教授及荒見君的合作教授张涌泉先生组成。

荒見君的报告通过对敦煌讲唱文学文献写本不同异本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的发展演变过程，有许多新的见解。评审专家著名敦煌学家项楚、郑阿财先生以及考核小组的专家都对荒見君的报告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荒見君出站以后将回日本明海大学任教。

研究生动态

我中心硕士研究生梁浩等四位同学 通过硕士论文答辩

我中心2002级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于2005年1月15日下午举行，参加答辩的同学有梁浩、徐婕、真大成、钟舟海，论文题目分别为《〈酉阳杂俎〉词汇研究》、《〈型世言〉吴方言特征词研究》、《〈南齐书〉词汇论稿》、《〈本草纲目〉药名及其联绵词研究》。四位同学撰写的论文受到评阅专家及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

获奖信息

第三届丁邦新语言学奖评选揭晓

经本人申请、校内外专家初评、中心评奖委员会最终评定，第三届（2004年度）

丁邦新语言学奖获奖名单揭晓：

张小艳（2001级）获博士生一等奖

丁喜霞（2002级）、王建莉（2002级）获博士生二等奖

真大成（2002级）获硕士生一等奖